

1103
第八輯

蒼南文史資料

CANGNAN
WENSHI
ZILIAO

93

中国人民政治
协商会议

浙江省苍南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苍南文史资料

第 八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
苍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九三年一月

目 录

刘绍宽与教育·····	陈镇波	(1)
苍南海洋渔业渔具捕捞方法的变迁·····	梅永炼 林加养 郑集春 苏垣瑜	(47)
苏岛抗日反法西斯殉难志士陈季华·····	卓寿谦	(64)

刘绍宽与教育

陈 镇 波

刘绍宽从二十岁开始“授徒”，四十时任温州府中学堂监，一直到六十以后仍有一些人从学，一生几乎与教育结不解缘，对平阳与温郡的教育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。夷考他一生从事教育的经过及在教育理论方面的思考与探讨，不仅有助于对近代温郡教育发展历程有所了解，且对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也有重要的借鉴价值。今按时间先后，将他从事教育事业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叙述，即探索阶段，办学实践阶段及散兵游勇阶段。

一、对教育的探索

公元1873年（清同治十二年）“绍宽六岁读书舅家，与表弟子闇同学十四年，小溪、仲愚两舅氏教授之力为多。”①开始时是从杨琴舟（佩言，廪贡生）学句读，八岁从杨省三（佩箴，县学附生）学，十一岁从杨巽卿（佩琛，县学附生）学。十二岁起因舅家分炊，他随母搬离舅家约百余步，租杨玉笙（县学附生）右厢房居住，开始到外家走读。自十三岁到十七岁，都是从项雨农学习。项雨农名廷祺，小南人，是仲愚的高足弟子，一位贡生，“博通经史，精制艺，邑中名宿多出其门。”②仲愚名镜澄，号愚楼，王理孚在

《题杨愚楼先生遗像序》云：“先生少从瑞安孙太仆（衣言）学，与公子籀庠（诒让）征君随官皖鄂，一时知名士皆与之游。而以冯蒿庵、吴补松两遗老为犹密。文场蹭蹬，乃以永嘉经制之学教授乡里，吾邑学风为之一振。”小溪名纯伯，晚年自号逊伯，是增贡生，候选训导。这两位杨家舅氏虽没有亲自教授绍宽，但茶余酒后的指点，平时耳濡目染，对他影响却很大，并由此得到瑞安孙衣言、孙诒让等的熏陶，有利于他的成长和工作。子闾则是他的表兄弟，名慕侃，光绪己丑科（1889年）举人，其舅镜清（筠坪，廪贡生）的儿子。绍宽十七岁，县学考试第一，得到知县汤肇熙的“激赏”。秋天，学使祁世长按临平阳，他考取了县学附生。十八岁，县学训导吴承志授他地理考据之学。十九岁，筠坪请泰顺拔贡周舒茨（恩湛）课读子闾，他从学《周礼》。二十岁，开始了独立授徒的生涯，学生有杨慕俦、王理孚二人。第二年增加了陈毓琦，即陈仲芸，烈士陈再华的父亲，县学附生。

王理孚的《万石山墓表》一文对此有所叙述：“理孚年十一，始入厚庄刘先生之门。时先生方治颜习斋、李恕谷之学，竞竞焉以实学实用开来继往为己任。我父一见，即长揖以请曰：‘我武人，不能教此子成材，今以累先生。可教请教之，不可教幸早以告我，当令其改习农商，不再为之择师矣。’故刘先生之教理孚异于常儿，理孚亦惟恐刘先生不屑教诲，将终身不得为士人也。先后五十年，不易他师，学虽未成，然亦不见摈于士类。”③可见他一开始授徒，便与一般的塾师不同，着重于“实学实用”。但这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，即青年的刘绍宽，是在不断地探索着前进的。这一转变，是从二十二岁跟从金晦学习后开始。他在自撰《年谱》（未完稿）一开始，便深深反省过去所学说：“十八岁，吴学师授以顾震沧《舆地歌括》、贾昌朝《群经音辨》及顾亭

林论学等书，意欲导以习小学及考据、地理诸书也。此时应往请业，讲求读经之法。况是时，内有逊伯、愚楼两母舅，外有知县汤绍卿。受知师即瑞安孙太仆父子，文章经术冠当代，皆可因逊伯、愚楼两舅氏，从之请业。而乃读书十年，不出里门一步。故此，一循故辙，学无寸进。自是后至廿一岁，皆虚度光阴。一生学问之不大进展，实由此四年中误之。”为什么有这样的反省呢？原来二十二岁（光绪十四年，公元1888年）时，子闾请了瑞安金晦来白沙东墩杨家教学，他亦“从之学。师原名鸣昌，字稚莲，为仲愚母舅保童闹考事被连斥革。开复后遂改名。师课授经学，先以《诗》、《礼》。谓清儒经学家《毛诗》、《尔雅》、《说文》皆极研精。治《礼》先从《仪礼》，以条理简而易治也。治《毛诗》以陈奂《诗传疏》为宗，治《礼》以胡培翬《仪礼正义》为宗，而参阅《皇清经解》诸书，便得门径。于是子闾治《毛诗》，余治《仪礼》。师又授以《颜氏学记》。颜氏名元，字习斋，其学惩宋儒空谈性命之弊，反之实事求是，改《大学》‘格物’之训，谓如手‘格’猛兽之‘格’。谓‘乡三物’如‘六艺’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必须手‘格’习之，方有实用云。余得此始知有习斋之学。”④在《厚庄日记》中，刘绍宽多次以感激的心情记述金晦对他的影响，如1898年回忆说：“予自戊子从金稚莲师游，学问始少进。”1903年又说：“余自戊子之岁，从学瑞安金稚莲师，读习斋颜氏书，日有割记以为自课身心之地。”

金晦是对原平阳县在晚清时开风气的重要人物之一，晚年定居县城成为平阳人。他不仅在思想上、教育上给以刘绍宽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以巨大影响，且对平阳出现大批数学家也是一位决定性的人物。为了追溯这一渊源，先录《瑞安县志稿》的金晦传于下：

金鸣昌，字志曾，号稚莲。少有志操，学务世用，读经治史外，于天算、地輿、兵谋、武备、掌故、律例诸书，靡不讲求贯串。服膺颜元、李塨之学，谓躬行实践直接数千年君师学校之传，自中外通商后，各国政艺诸书渐多翻译，多重物质而废文事。鸣昌览之，自信其学益坚。有《治平述略》若干篇，大致溯原《周官》，参以欧美政学，兼采章学诚政教合一之说，而学为实学，用为实学，一以颜元为归。书未削稿，秘不示人，曰：吾将藏之名山，待之其人。苟非其人，书终废矣。又以绪余为《清官仪》若干卷，盖仿刘歆《汉官仪》之作，寓雅故于游戏者也。所与游有同邑许启畴、陈黼宸，乐清陈国桢，国桢弟虬，平阳宋衡等十余人，皆慨然有经世志，结求志社，人称曰‘布衣党’。少与黄绍箕、孙诒燕同入学，瑞校有‘三君’之目。晚尚困诸生，徙居平阳东郭，以卖浆自晦，改名晦，号遯斋。一夷岸岸，与傭保伍，见者疑为前后两人，而佛学益精邃，著《无始以来天人性命之本原》一书……，别有《心经了义》诸书，未刻。

刘绍宽评述金晦数学方面在温州地区开创性的地位说：“自利玛窦、汤若望等挟西算入中国，一时徐、李、梅、薛之伦，精究其术，迭启窾奥，而畴人之学，遂为有清之绝诣。瓯中风气榛塞，传习较晚，瑞安陈菊潭、金遯斋先生，独学无师，创通厥绪，后始有稍稍应者。”⑤这应者中，有金晦的学生万全陈宗虞、江南黄庆澄。后者“固尝以家贫亲老，奔走衣食，而时时以造就子弟提倡学风为己任，始终不易其志、不贬其节，吾邑风气之开，愚初之功最巨。”⑥有趣的是：黄是叶振甫的女婿，他的连襟吴允初，允初的女婿却是

著名数学家姜立夫。稍后于黄的，有吴次垣“尤精于算术”。在江南任校长17年余，李锐夫、杨宗道等数学家均出在江南，这当中的蛛丝网迹，不是值得注意吗？

刘绍宽廿三岁时，继续在杨慕侔家授徒。当时金晦主讲狮山书院，他仍与朱次庄（慕元）、鲍竹君（铭书）、黄源初（庆澄）、张幼明（陶）、陈雨亭等时时从之学，成为颜李学派在江南的积极传播者。他回忆说：“己丑（1889），稚师掌教金乡狮山书院，虽不能亲炙，而倡学颇不倦，又得黄源初，朱子昭两友时时启迪，故是年所得于学颇多云。”^⑦又说：“绍宽尝从瑞安金稚莲夫子游。夫子讲求经济之学，尝为宽言：有清之儒以顾亭林、黄梨洲、颜习斋三先生为大宗，而颜氏之学尤为醇正。顾其学躬行实践，学者恒苦之，近世通儒或比之墨翟。宜乎夫子之以倡率后进，咸恍然无有应之者。独我亡友朱君次庄闻风慕悦，特往受业焉。戊子（1888）之岁，夫子设教吾平，予与杨君子闾从之游，次庄课徒于邻，亦来请业，与予及子闾晨夕相切摩。尝欲规设礼堂，创置射圃、算法、乐章，与同志次第具举。所往来者，予及子闾而外，朱子昭、鲍竹君、黄源初为最密。”^⑧金晦对他在教育方面的影响，主要表现在：一、不愿以科举、时文教授生徒。《手撰年谱》载：“师（指金晦）谓此后时文可勿作，不若专肆力于有用之学，余于是遂无意于应举云。”一直到1890年，“因馆中生徒不能不授以时文，且以贫故，尚借官师月课以供膏火，不得已仍理旧业。然于宋儒学终不废，以其切于心身日用也。”^⑨这里说“不能不授”是因为学徒将参加科举考，有“非学时文不可之势。”^⑩金晦以后又屡以时文为戒，如《厚庄日记》1899年二月载：“午后谒金稚莲师，师言时文必终废。”五月，“午后与啸樵同至叙和酱园谒金稚莲师，师言：课读时文，戕

贼子弟，不为无过，可辍斯业。”二，转向对国事的关心。

1889年，“是时，局势日变（按：中法战争后边疆危机日趋严重），新学萌生。吾乡宋平子衡在上海，大倡‘广兴西学’之说，黄源初与之游。屡有信与稚师，师辄出以相示。于是知经世之务，不在戔戔之科举，而思想益为变迁。盖余自志学以来，至此始一转乎。”⑪三，设想创办新式学校。

1899年，“拟同志数人联馆，分任教科，设十二目：理学、经学、小学、史学、舆地学、算学、物理学、体学（医理附）、时务学、词章学、应试学。”这一设想，虽受维新思潮影响，但也是脱胎于颜习斋62岁主持漳南书院的改革，“建正厅三间，曰习讲堂。东第一斋西向，榜曰文事，课礼、乐、书、数、天文、地理等科。西第一斋东向，榜曰武备，课黄帝、太公及孙、吴诸子兵法，攻守、营阵、陆水诸战法并射御技击等科。东第二斋西向，曰经史，课十三经、历代史、诰制、奏章、诗文等科。西第二斋东向，曰艺能，课水学、火学、工学、象数等科。”⑫四，重视思想教育。“稚师言：后教学僮，须命志气开发，勿令萎靡，中国败坏，皆在萎靡之故也。”王理孚回忆说：“刘先生督课綦严，夜以继日。一日亭午，海髯假寐，即举‘不雕嫌朽木’命对，应曰：‘勿剪爱甘棠，’大为激赏。”⑬五，注意教师自身知识品德修养。《日记》中所记甚多，如“金稚师谓宽，学问不患不实，惟患不阔大，须多读有用之书，境地自然宽阔。”“好问则裕，自用则小。”“行焉必着，习焉必察，日间所应接，虽极庸鄙人，其言亦必有理，不可忽也。”

“道理于心上悟出，于书中勘出，于口头说出，而不于行习间做出，终是虚悬无□，此古人所以博学而近思，言顾行、行顾言也。”六，注意儿童心理，改进教学方法。“教小儿，终日海读于其侧，师苦而小儿亦不快。且小儿拘束习

惯，一旦稍弛防闲，彼即放恣不肯受教，使后人难乎为继，此必不可。惟总揽一日功课之大纲，勿使拖欠；讽诵章句，时时听察而提撕之。使之心有所警，体无所拘，则乐诵读而服吾教，与夫终日束缚驰骤，使若牛马者，似有间也。”他在1895年10月17日《日记》中，又加阐明：“馆中诸生皆功课勤勉，惟学书、福弟在馆甚宽。因自立日课表，并教福弟云：上下午书课读熟，不规早晚，即听憩息。福弟欣然力教。因思小儿读书，断不可令生机苦窘。少时从项雨农师，终日囁囁，颇为所苦。雨师近亦自悔教子及徒一味拊循经书。但令读过不令背诵，此又不可，更不若昔日之严于课诵，犹有所得。窃谓训蒙之法，但须少立功课，严加程限。一日六、七个时，幼童有二、三个时，稍长有四、五个时读书，功课已足，余均可令出馆憩息。此三、四、五个时辰中，书当背诵者、当熟读者，一点不令放过。缘功课既少，小儿既易应课，且有憩息在后，小儿亦快乐奋勉为之，断断不至拘苦。至出馆憩息，防其作孽，但须长者时常防闲耳。鄙意谓：小儿游戏之事亦多不可省。盖小儿之性甚动，出外不能不嬉戏。其嬉戏固多损伤，然亦多有益之事。如博奕二件，无益有害，须悬为厉禁，余若踢球、超距及一切角力角技诸事，并丝竹弹唱，均无不可为。但须长者于塾近旁另设一嬉戏之所，听小儿于诸事自择之。如踢球之类，运动血气，增长材力；丝竹之类，亦令渐解宫商，将来学琴学乐，亦易入门，虽曰嬉戏，即是储材，所谓‘游于艺’也。至于温书，则本日既已熟读，既已零温，则每册每部统温时，但须长者面坐，程课令留心检读一二次，每月读过，温书一次即可。如项师上年之部部督令背诵，则可不必也。”这些，都表现了他对传统训蒙方法之背离，和对新的教学方法探求和思索。

甲午中日战争前后，民族危机和清廷的腐败刺激和惊醒了广大人民，刘绍宽深切地感觉到“古今治术自唐虞一变而为秦，自秦至今，又将一变矣。秦汉以来之天下，其治法决不能上同三代，自今以后，又不能尽同于秦汉以来矣。”封建专制统治已非变不可了。这段时间，他的视野更趋开阔。一方面，“自中日和议成后，朝野激昂，竞谈时政，余亦缘是始富于国家思想，于从前又一转变。”^⑭“此数年闻见较阔。”如1895年9月，他深刻批评了洋务派失败的原因：“中国改营制、筑炮台、购船械，讲武亟矣！去年东省之败绩，逃兵皆诿枪炮之不利，谈洋者举信之。夫船坚炮利，外夷所长，而其君民一体，志虑专精，尤非中朝所可及。讲求洋务而不此之谋，吾恐购船购炮，靡费不貲，及至交绥，又悉以予敌，自毙当更速也。”另一方面，戊戌变法前后，与宋平子、陈虬、陈介石、孙诒让、黄仲弢、徐班侯等结识，时聆教诲，并广阅《申报》、《时务报》及西书译本，对教育的探求认识，又深进一层。如《日记》所记：

报论中国宜建女塾，极是”（1896年）

同陈子蕃谒陈介石先生，因同往利济学堂一游。学堂为陈志三先生所办，课以中医书，章程井井有条。

筱垞函致子闾云：现在江西书院一律改从新学，宁波设立学堂数处，瑞安学计馆外，自设算塾者甚多。泰兴潘玉如先生辞馆回。潘于算学不甚精深，教人专以成法，讳谈算理。《华氏笔谈》、《数学启蒙》等书禁初学不令阅看。《代数术》专令习24条款，而不令看前数页。又以《梅氏丛书》为秘本，令学徒手抄其书，盖黔驴技穷也。（1897年）

昨谒陈志三丈，因问侯宋燕生。燕生新自日本游历回，其言日本小学事，无论男女，自七岁至十四岁

皆入学。其读书分四科(修身、历史、舆地、物理)外，又有书(和文、汉文)数、舞(体操)、乐等科。大约前四年入寻常小学，后四年入中等小学，以故通国人无不知书，至于报馆林立……以故民智大开，非吾国所及，西国咸忌而抑之。(1898年)

夜晤黄仲弢、徐班侯两先生，得聆雅教。仲弢先生推尊西学，以为暗合三代之治。且言时文改为策论，仅可以为过峡文字，必须整顿学堂为要。

午后同逸仲至仁智里谒宋燕生先生。燕生盛称日本学校政治之善，言彼国车夫、马夫亦胜于中国之王公大臣，缘皆能阅报也。

午后，宋燕生先生来，言日本著书、献书均有赏杯……故国中著书出板，一岁不知其数。日本学问几括中西之全，佛学有四宗三十二派，每派各开讲堂，各列三等学校。专以西学论，当以美国学校为最，若统中西之学而论，自当以日本学校为五大洲之冠……又论君主国、民主国、君民共主之国并列地球。君主之国必弱，上之压力太重，虚使其下，下之民智不开，愚瞽以奉其上，以遇他国，人人皆智，焉得而不弱？大抵君主之国，将来必尽为君民共主之国；君民共主之国，必皆变为民主之国，必然之势。由君主变为君民共主其势难，由共主变为民主其势易……。

午后至昌言报馆，旋至算学报馆少坐。回，晤宋燕生先生、为蒙学报馆叶涉吾于沪上创设速成教习学堂，延请陈介石先生掌教，以书来属转致。其《章程》一遵日本，精当之至。据云：书坊所刻《日本学校章程》粗得大致，谬误尚多，此《章程》由叶专向日本访得。梁卓如《大学堂章程》较之上年中国

所定为胜，以比日本，尚有许多窄隘不得要领处。如各国□□文字，日人列之小学堂，今列之大学，已为隘陋。算学设专门，亦一中国从前陋习。东西各算学分隶诸门，不设专学。专便虚而无着。经学理学不可分科，经即理，理即经，宋明儒说理无尝非谈经。兵学则宜设专科，不得并入学堂，与之一例云。

夜阅《文学兴国策》。此书为日本维新时议开学校，遣驻美公使森有礼访问于英之教育家，辑其答复书而成此编，广智书局刊。

1899年，刘绍宽三十三岁。他开始离江南，受聘到县城西门俞蔚文家授徒，学生增加到十余人。这时，他急于谋求教育救国，曾与杨愚楼、金晦商量办化学学堂，在孙诒让帮助下省批：由“瓯海总局每年拨银钱二千元以充学堂经费。总局复认每年拨银九百六十元，藩宪批准存案。孙仲容先生已嫌其少，又以金稚师言论多与未协，遂稟请归平阳自办。济庵乃拟举诸葛和卿与余董其事。余因同济庵至和卿先生处商领款事，并议学堂基址及章程一切。”到1900年春，他们三人“至姜埕访方旭林先生，移支‘大文成’之款（即全县筹集支援科举考试的基金）为化学学堂经费，旭林先生允一百圆。”次日，又到“仙桥，晤王雪槎，亦支文成款约百五十元。”但最后，化学学堂没有办成功。事后刘绍宽总结这一教训说：“欲办化学学堂，不求教师，不充仪器，不谋校舍，常年的款仅木捐九百多元，未曾具领，而欲侈借一、二百元，便行举办，不知当时何以冒昧如是！姑录之，以见当时风气未开之被动者，寻声逐响往往如是。”办学不成，对继续教私塾，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“本年失误，在仍授徒为业……来年如立意求学，一到上海，托源初觅人授课，且可以此结识海上名流。较之在乡课徒，糊口于佔毕，托业于改卷，

究心于虚缩吞吐之间，措笔于惝恍迷离之际，洒一世心血于无用之地，侥倖其人之弋获一衿，以得区区之酬谢，相去不亦霄壤耶？”^⑮因此认为“是不得不亟思改图者也。”

二、教学理论研究和办学实践

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至民国初年十余年中，是刘绍宽对教育作出巨大贡献的阶段，在理论研究和办学实践上，都给后人留下许多宝贵遗产。本文将从试办平阳学堂，赴震旦学院和日本考察、温处学务处和温州府学堂工作三方面予以介绍。1901年，刘绍宽三十五岁。八国联军侵华和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，使中国深深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。清政府迫于全国的反抗怒潮，不得不重议变法。下诏命京外官员陈奏新政，孙诒让曾撰变法条议四十篇（即《周礼政要》）以应。其中关于教育者，有“广医”、“通艺”、“通译”、“观新”、“教农”、“考工”、“考医”、“收教”等篇。是年秋，清廷有诏令各省、府、州、县设立学堂。温州基督教会在朔门外海坦山麓设立了艺文学堂（1928年停办）。温处道童兆蓉将蚕学馆改为温州蚕桑学堂，瑞安在冬间也将学计馆、方言馆合并为普通学堂，设中文、西文、算术三班。各方面的形势，使刘的教育思想开始深一层的转变。他在1930年回忆说：“余平生学问，自六岁入学至廿二岁而一转变，三十五、六岁而又一转变也。”在《手撰年谱》中曾深刻反省前一阶段的自我封闭：“余自戊戌朝考报罢后家居授徒，自窒见闻。值此数年中〔如〕求学沪上，多识名流，泛览新籍，归而办学，所得必不止此。”又说：“康梁事变后，《清议报》风靡全国，庚子再变，朝野幡然，益趋新政。学报勃兴，译籍日出，不能于此时扩充见识，讲明实学，而惟于乡间购取一二新译书，如

牖中窥月，亦何益耶！”

1902年，刘被聘为龙湖书院山长。“而时奉诏令，各直省府州县书院改并为学堂。知县胡克之为和来商，余以办学堂必须请〔陈〕少垞出为监督。院址狭隘，不足以容生徒，须借县婴局为之。大令问予将如何？余谓可作教习，主持教务。乃定议请少垞出办。少垞让监督于吴祁甫师而自为堂长，以此时所谓学制有监督、有堂长也。”①⑥平阳县学堂设在坡南汇头（即今平阳县小），次年定为中学堂，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改为高等小学堂。初办学堂，怎样着手呢？

“新诏巍科废，鸿儒实学研，佉卢文字重，周髀术家专，乡校初开讲，师资忝备员。”①⑦他认为“李侍郎奏请推广学校一摺内：‘府州县学，选民间优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，其诸生以上欲学者听之。学中课程，诵《四书》、《通鉴》、小学等书，而辅之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、天文、地理之粗浅者，万国史记近事之简明者，格致理之平易者，以三年为期’。此数语可为今县学堂之法。”其次是向瑞安取经，向孙诒让求教。县学堂在五月十四日至十九日三次招考学生，共招正取40名，备取20名。教师三人，刘与陈振椒子蕃、任中文教习，聘江苏常州陆震听秋为西文教习，陆是上海圣约翰书院毕业，月工资80元。刘原来任龙湖书院山长时“修膳数160千文”，移作“为学堂修膳费。所有从前从学学生愿入学堂者悉入学堂，不愿者听其他适，束修（即书院学生的补贴）一律截止。”西文教习任西文、格致、算学、体操四科，刘与子蕃分任修身、读经、中史等课。廿五日举行开学典礼，“胡大令亲来，先谒圣，次教习，次总理、司事，次学生。胡令乃拜教习，教习同拜，学生进拜教习。礼毕，胡令去，监督吴广文师来说‘学而’首两章，言孔教纲领不外乎此。西文教习于午后二时分发诸生书

籍笔墨等。”第一学期至六月二十日放暑假，八月中旬开始复课。次年教员增加王魁廷子秩。学校新创，一切都在摸索中，如“堂中学生甚少，而不学西文者又不能上班，中文无所施教，拟议颇费踌躇。”班级编排因年龄、程度相差悬殊，学生意见纷纭。1903年十一月初十，发动学生讨论与答辩，预议学制。结果，“可采者尚多，而未协者亦不少。”《日记》中曾留有摘要三则：“特班自修，大学堂本有此制。盖欲网罗成材，储以有待，特设此科。若中小学堂则于意云何？如谓学问已成，非小学程度所能限制，则何勿保送大学？如因年齿既长，难与小班随行听讲，则未闻论学而以年齿为程度者。即大小两班不能并合，只有设法分教，不能揜大者于不教。此诚创办之时，主讲者立议苟简，贻误至今，不可不改。其有程度果超者，自应送入大学以资鼓励。”“学有普通、有专门。普通者，启初学之门径，辟专科之基址。盖不通各科浅理者，不能通一科之精理，与孔、孟博约之旨本不相悖。今诸生未知普通，辄讲专门，且谓普通为专门之反对，殊失学理。”“同学之无团体，由未尝培养公德与社会所由组织之实情，此须讲修身、伦理（小学称修身、中学以上称伦理）两科，堂中于此尚为缺点，急须补入。”一直到1904年正月廿二日，“午后将新生考问甄别一过，计留十五名，有六名拨归外斋作预备科。”次日在历年招收学生基础上，将学生重行编班。“堂生中文分甲乙丙三班，西文亦分三班，亦有专修中文者，共十二班、中西甲班，中西乙班，中甲西乙班，中乙西甲班、中甲西丙班、中丙西甲班、中乙西丙班、中西丙班、西丙中初班、中甲班、中乙班、中丙班。名次功课已拟行榜示。”事后刘又自我解嘲地说：“今按当时班次如此参差，几令人失笑，而实则齐不齐者而使之齐，初步不得不如此。此时如有道尔顿制，教育必有以善施之也。”课本方面，则说：

“听秋兄购到京师大学堂讲义甚佳，可作教学模范，”并与王子秩“定堂中功课。”在学校管理方面，“拟堂中章程三十余条。”“择定堂长四名，照堂章四星期由学生公举一次：陈箴、陈宝光、陆鹤年、陈鸿玑。”学生已发展到五十余人。

1903年10月，他在参加科举考试后，与殷铸夫、杨子凯、宋季玉等到了“规模甚敞”的南洋公学参观学习，结识了马相伯先生，深受器重，将李之藻翻译的《名理探》“钞本属校，将以付刊，”他深感“得读为快。”他那时虽患目疾，在上课之暇，“即改编《蒙学课本》，”并“谒马相伯夫子，谈训蒙之法甚详。又言《内则》‘教之数与方名’，其言方名乃地名，非仅东西南北之名也，说颇精确。

‘方’盖职方氏之方。”他本欲在学院学习外语，准备出洋留学，15日“得陈兄小垞促归之信，”放心不下县学堂工作，“遂决意辞退。”16日，“午前谒马夫子辞行，夫子囑编《蒙学》书甚丁宁。”“马相伯先生言中国工艺之拙，仅守古法，不自出新意以求适用。而士大夫束发入塾，即为无业游民，不复在工艺有所措意，以致器日苦窳，商业大衰，而利权遂为外洋所夺。不知外人虽贵为天子亦下执工业，陶冶斤斫皆躬为之，非仅大彼得之入船厂而已。中国古时士人尚执贱业，如嵇康好锻诸事，史传往往言之。唐宋以后，兹事遂希，亦可见世风之变矣。”23日，在瑞安拜访了孙诒让，“午后与志凯自瑞回，夜到县学堂，陈君子蕃在焉。”

他在本年总结中说：“按是年任教平阳县学堂，与陈子蕃、王子秩相切磋。西文教习陆听秋学问虽不甚深，而闻见较之本地人为广。闱后入震旦学院，虽仅十余日，学问全无所获，而颇知外间学校之规模。自是以后，悲悯之念日深，国身之系日切，校之十年前则大异矣。然从前所为义理训诂之学，从此遂疏。”震旦回来后，对县学堂教育之影响，可